

未名社科·大学经典

菊与刀

日本文化模式论

+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社科 · 大学经典

菊与刀

日本文化模式论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何道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美)本尼迪克特(Benedict,R.)著;何道宽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

(未名社科·大学经典)

ISBN 978-7-301-21835-8

I. ①菊… II. ①本… ②何…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2353 号

书 名: 菊与刀: 日本文化模式论

著作责任者: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何道宽 译

责任编辑: 周丽锦 陈相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835-8/C·08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9.5 印张 203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经典作家小传

鲁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1887—1948)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模式论创始人、二战前后美国两大人类学女杰之一、心理人类学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人类学历史学派创始人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 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她于1927年开始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后写成《文化模式》(*Pattern of Culture*, 1934)一书,开拓了文化和个人性格研究的新方向。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的民族性的研究,而其中以对日本的研究——《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一书的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病逝。

名师点评

《菊与刀》一书是以对个案访谈和关于日本文化诸议题的资料的严谨分析为基础写作而成的。儿童教育,以及个人生命中的各种事项被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前进了很大一步,使文化和个人性格研究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人类行为与政治和宗教制度比与人的生物性更为相关。

——玛格丽特·米德(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菊与刀》》从对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学习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穿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

——金克木(北京大学教授)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尽管作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的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全貌。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

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

——川岛武宜(东京帝国大学)

《菊与刀》是一部研究日本的名著,最初发表于1946年。由于近年来中日关系是国人关心的话题,作为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日本的国民性)的名著,《菊与刀》可以使读者对日本的国民性有更多的认识。……《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崔世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文化研究室主任)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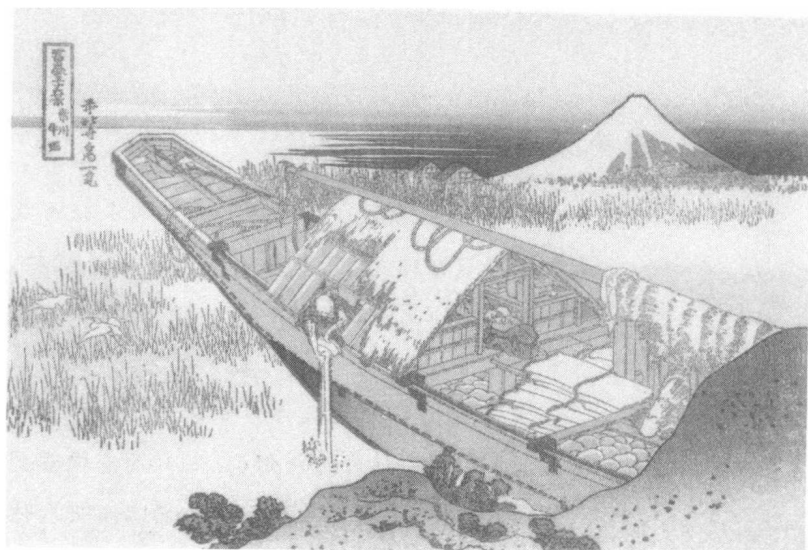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受命研究日本 / 001
-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 019
- 第三章 各安其位 / 039
- 第四章 明治维新 / 069
- 第五章 欠时代和社会的恩情 / 089
- 第六章 滴水之恩,难以回报 / 105
- 第七章 情义的回报“最难承受” / 123
- 第八章 维护名誉 / 135
- 第九章 情感的世界 / 163
- 第十章 道德的两难困境 / 179
-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 207
-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 / 229
-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 267
- 译者后记 / 285

第一章 受命研究日本

经典名句

◆ 战刀和菊花是这幅画的一体两面。日本人极富攻击性又不冒犯别人，既穷兵黩武又有审美情趣，既骄横又和蔼，既僵化又善变，既恭顺服从又不听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怯懦，既谨守传统又顺应新潮。他们非常担心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当别人没有觉察到他们的过失时，他们又因愧疚而惴惴不安。他们的士兵既俯首贴耳、绝对服从，又桀骜不驯、长有反骨。

◆ 只有在注意到一个民族生存中最司空见惯的现象时，你才能充分意识到人类学家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原始部落也好，最先进的民族也好，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都是后天学会的。无论其行为或意见多么古怪，他思想感情的方式与他的生活经验都息息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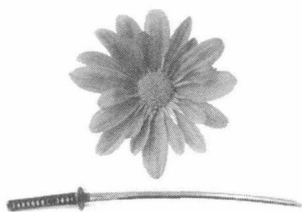


《富岳三十六景・常州牛堀》

在美国与之拼死交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为陌生的。他们的行为与思维习惯极为独特,过去与强敌作战时,我们没有必要考虑这样的因素。与 1905 年的沙皇俄国一样,日本人全副武装、训练有素,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西方国家接受的、战争里的人性常规显然并不存在。如此,太平洋战争之艰苦卓绝就远不止涉及连绵不绝的抢占滩头、夺取岛屿,也不止是难以克服的后勤补给问题了。于是,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他们的行为,然后才能对付他们。

困难之大,难以尽述。自日本闭锁的国门被打开以来的 75 年间,对外人对日本人的描绘用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但是又”,人们对其他任何民族进行描绘时,都不曾用这样的语汇。严肃的观察家论述其他民族时也许会说,某某民族彬彬有礼、前无古人,但他不太可能补上一句:“但是又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如果他说某某民族顽固僵化、无与伦比,也不会补充说:“但是又欣然适应极端的革新。”如果他说某某民族恭顺服从,就不会说这个民族很不容易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如果他说某某民族忠心耿耿、宽宏大量,就不会说,“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恶意”。如果他说某某民族无所畏惧,就不会说他们畏首畏尾。当他说某某民族很在意他人的意见时,就不会说他们真诚的良心令人吃惊。当他议论某民族

的军队里机器人似的纪律时,他就不会说他们桀骜不驯、长有反骨。当他说这个民族专心致志、热衷西学时,他就不会再放大他们热情的保守主义。他用一本书论述这个民族普遍的审美狂热、对演员和艺术家的尊敬,描绘他们如何醉心于栽培菊花的艺术;如果是这样,通常他就不会再写另一本书来描绘他们对刀术的崇拜,以及武士至上的威望。



菊花与战刀

然而,这一切矛盾都是论述日本
的任何著作不可或缺的经纬,而且
是千真万确的矛盾。战刀和菊花
是这幅画的一体两面。日本人极富
攻击性又不冒犯别人,既穷兵黩武
又有审美情趣,既骄横又和蔼,既僵

化又善变,既恭顺服从又不听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怯懦,既谨守传统又顺应新潮。他们非常担心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当别人没有觉察到他们的过失时,他们又因愧疚而惴惴不安。他们的士兵既俯首贴耳、绝对服从,又桀骜不驯、长有反骨。

战时的美国需要了解日本,这是迫在眉睫、极端重要的任务。上述矛盾以及其他许多显著的矛盾,我们都不能弃之不顾。我们面对的危机接踵而至。日本人将要做什么?如果不入侵其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天皇的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有何期望?在对日军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说什么才能挽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才能削弱他们战到最后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日本通们的各种建言也见仁见智、尖锐对立。和平来临时,为了让他们规规矩矩,我们需要对他们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吗?我们

的军队不得不清剿日本山区要塞里死拼到底的日本兵吗？日本会不会发生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那种革命，然后才能实现国际和平呢？谁会领导那样的革命呢？另一种选择是不是灭绝日本人呢？不同的判断会产生天壤之别的后果。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对我的要求是，用我所能调动的一切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详细描绘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初露端倪、异常猛烈。许多美国人还在说，对日作战还要打3年，或者10年，甚至更久。日本人还在说要打100年。他们说，美国人只取得了局部地区的小胜，新几内亚和所罗门业已失手，但这些岛屿离日本列岛数千英里。日本官方的公报拒不承认海上的惨败，民众仍然自认为在打胜仗。

但那年6月，战局开始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统帅部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以欧洲战场优先的方针有了回报。对德作战的胜利已然在望。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预示日本终将战败。自此，我们的士兵常常与日军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缅甸的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役中，我们深知，我们所面对的是令人生畏的敌人。

因此到1944年6月，回答有关日本帝国的许多问题就至关重要了。无论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无论高层提出的政策问题还是到日本人后方撒传单的问题，每一种洞见都意义重大。在举国动员的对日作战中，我们必须要知道许多答案，不仅要知道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要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不仅要知道经济的和军事的统计数据，而且要知道日本政府指望日本人民做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日本人思想感情的习惯，了解其思想感情

的模式。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意见背后约束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尽可能搁置美国人行为举止的前提,以免轻率断言,在给定情况下,我们的行为举止如何,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就应该如何如何。

我的任务有困难。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战争期间你容易谴责敌方,予以全盘否定;更加困难的是尝试用敌方的眼睛察看其生活。但我必须迎难而上。问题在于日本人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时会如何行动。我必须要将日本人的战时行动作为理解他们的资产,而不是将其视为负担。我不得不察看他们作战的方式,暂时不将其当作军事问题,而是视之为文化问题。战时也好,和平时期也好,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特质。他们的作战方式表露了他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呢?他们的领袖如何鼓舞士气,如何安抚困惑的民众,如何利用战场上的士兵,这一切都会显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可资利用的优势。我必须穷究战争的种种细节,以便看清日本人的行为特征是如何一步步显露出来的。

然而,两国正在交战,这是我遭遇到的严重的不利条件。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我不能去日本,不能到日本人家里借宿,无法观察他们日常生活里的紧张和压力,无法亲眼分辨哪些是关键问题,哪些是枝节问题。我不能观察面对复杂问题的决策过程。我不能观察他们的孩子的成长过程。我只有一种田野调查的书可供参考,即人类学家对日本村庄的研究,这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价值连城的《须惠村》(*Suye Mura*),但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问题这本书尚未提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我可以采纳一些技法和假设。至少我不必放弃人类学家倚重的面对面研究。许多旅居美国的日本人是在日本长大的,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验的具体事实,

《须惠村》(*Suye Mura*, 1939),是人类学家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写出的一本关于日本村落的著作。其作者为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 1908—1950),美国人类学家、日本问题专家,二战期间受聘于美国陆军部,参与人员培训。

发现他们如何判断这些事实,用他们描绘的经验来填补我们知识的缺口。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这些知识是理解任何一种文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研究日本时倚重的是,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数据,跟踪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我相信,他们追寻的许多答案嵌入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中,如果倚重实际上生活于其中的人去探索那种文化,我们就能发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读文献,我感谢曾经在日本生活的西方人留下的著述。有关日本的文献浩如烟海,优秀的西方学者对日本的观察著述汗牛充栋。与其他人类学家相比,我的有利条件略胜一筹。到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地去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不得不研究无文字的部落。这些部落没有书面语,不能把自我流露的信息诉诸笔端、留在纸上;而西方人留下的评述既稀缺又肤浅。没有人知道这些部落的历史,所以人类学家不能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只能靠田野调查去发现:这些部落人的经济生活如何运行,他们对社会满意的程度,其最重要的宗教生活是什么。在日本研究方面,我是许多学者的后继者。对日本人生活细节的

许多描写深藏于古籍中。欧美人士以生动的文字描绘了他们的经历,日本人留下了异乎寻常的自我展示的文字。和许多东方民族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冲动去自我表露。他们既记录琐碎的生活细节,又阐述自己全球扩张的规划。他们的坦承令人吃惊。当然,他们不展示全景,任何民族都不会。日本人写日本时,常略去许多非常关键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像我们呼吸的空气,让人视而不见、习而不察。同理,美国人写美国时,常常也会忽略自己熟悉的东西。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喜欢展露自己。

我阅读文献的方式颇像达尔文重建物种起源理论时的读书方法,特别注意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为了理解议会演说里杂然纷呈的思想,我需要知道什么呢?他们对情有可原的小问题猛烈抨击,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轻易接受。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停地问:这一场景到底“错在哪里”?为了理解,我需要知道什么?

我还在看日本人创作和拍摄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表现当代东京生活和乡间生活的故事片。事后,我又与日本人一道重温这些片子,其中一些是他们过去在日本看过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以日本人的视角看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和反面人物,与我的视角大不相同。当我云里雾里、不解其意时,他们却能一目了然。他们看情节和动机的方式有别于我,他们从影片的结构去看,当然是自有其理的。至于对小说的理解,我们的差异就更为悬殊,我感觉到的字面意思和他们所理解的意思迥然不同。一些日本人急忙为日本人的习俗辩护,另一些却仇恨日本的一切。至于我从哪一种日本人那里学得更多,真还难以说清。而日本人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两种人所描绘的熟悉的画面,却相

当一致,无论其态度是欣然接受或痛加排斥。

人类学家搜集材料、获取洞见时直接走向他们研究的民族和文化;就此而言,他所做的工作与旅居日本的精明的西方观察家无异。如果他能提供的洞见仅限于此,他就不可能在这些外国旅居者宝贵研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然而,文化人类学家训练有素,他拥有一些特殊的资格;尽管文化领域已有大量的学者和观察家,他还是不妨一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了解亚太地区的许多文化。日本人的许多生活安排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海岛上的原始部落有不少相似之处。一些相似性见于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或波利尼西亚。遥想这些相似性是否显示古代的迁徙或接触,固然十分有趣,但这种文化相似性知识对我而言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有历史关联。原因毋宁是:在这些比较朴素的文化里,我知道其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是如何运作的,我可以从其异同中找到解读日本生活的线索。我还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略知一二,因此,我可以对日本和其他民族进行比较,因为日本的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与这些民族相关。通过对原始民族的研究,人类学家业已反复证明,这样的文化比较极其有用。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与相邻部落可能有70%的相同之处,但为了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它的风俗习惯经历了一些变化;其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与邻居是不相同的。在变化的过程中,这个部落可能会摒弃一些基本的风俗习惯,但无论被摒弃的部分比例多么小,该部落的未来发展道路总会有一个独特的方向。总体上,不同的民族有许多相同的特质;人类学家研究其差异,这种研究的应用价值,无与伦比。

人类学家还必须适应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最大差异,为

此,他们必须要磨砺自己的研究方法。他们从经验中获知,不同文化的人面对的情景可能有天壤之别,他们对这些情景的理解也别若云泥。在北极村或热带沙漠里,人类学家面对全然陌生的亲属责任或经济交换,连狂放不羁的幻想也不可能凭空杜撰这样的文化特质。他们必须要对这些亲属关系和经济交换进行事无巨细的研究,而且还必须对其影响进行透彻的研究;他们还要仔细调查,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这些习俗的制约,如何将其代代传承。

对文化差异及其制约和后果,人类学家表现出专业关怀;这样的关怀用于研究日本必大有斩获。对美国和日本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无人不察。我们有一句民谚说:无论我们干什么,日本人都反向而行。除非研究者满足于说,这样的差异不可思议,这样的民族难以理解,否则人们对这两个民族文化差异的信念是没有危险的。人类学家的经验充分证明,即使奇异的行为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理解。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专业的人类学家能更好地利用文化差异,将其视为资产,而不是负担。正是因为这些表面上奇异的现象,他特别注意制度及其民族的差异;差异越大,他越是注意。研究一个部落的生活方式时,他不会将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他不会只挑选少数事实去考察,而是要审视一切。在研究西方民族时,缺乏比较文化训练的人总是忽略大块大块的行爲领域。他们把许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对日常生活习惯于不去探索,对日常事务中被普遍接受的判断总是忽略不计。这些平凡的事物被投射到民族的屏幕上以后,俨然会小事放大,关乎民族的未来,其重要性甚至胜过外交家签署的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完善研究平凡现象的方法,因为当他研究部落